

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裙屐蹁跹，楼台掩映。回首良辰，俯仰陈迹，谁谓星移物换，光景常新哉。试忆曩时，叶君叶舟、丁君鹤庐、吴君潜泉，湖楼一榻，以研讨斯籀、抚刻印玺，为闲居消夏之乐。而王君福厂，时时从金沙港畔来会，优游泮奭，岁月清华。未几而印社成，印人聚，泉石增基藻绘，花草咸有精神。然苟非二三君子，有希古通方之雅，益以经营策画之劳，则江山虽美，未必即为人文之助也。

——《西泠印社志稿孙智敏序》

西泠印社

XIL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ARTS

封泥研究专辑

总第十八辑



西泠印社编
荣宝斋出版社

此以日足安中實識
 今下香台宋人誤也
 顧其以解金是明



中隻反隻是明
 阮氏誤識隻野
 隻月



此刻羅永土器余未新
 見一張年未初也



劉鑒台東奇風宋東所
 皆實宋所金五字見
 子皆宋所金五字見
 樣後已時即

諸文達字多如此古今算
 从久者誤也周傾陵錢
 大如是年字大因正許舊从
 今止誤一發薛而孝台金
 卿同實子檢



六朝 隋造像及钟鼎拓本屏之一
 赵之谦题跋

● 主 编 导 语 | 陈振濂

本期《西泠印社》精心组织了一个关于秦汉封泥的学术研究专辑。

研究印学者多注目于实际的篆刻印章。封泥出土时间较晚，在学术史上尚须重新定位，许多学者对如何措手封泥研究也甚感迷惘。投入的专家不多，自然也难有充分的成果群。且过去研究封泥，是以文物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为主。印学家或篆刻艺术家们如何去看待封泥，更是一个需要由专家加以引导的新课题。本期所收学术论文集中了秦封泥、汉封泥以及封泥发掘史、封泥鉴赏、封泥研究资料等内容，勾勒出了一个关于“封泥研究”的从学术架构到方法论的立体的系统。

去年西泠印社曾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系列活动，今年奥运会马上要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金石印社的同道们，以2008奥林匹克图标为主题进行篆刻创作，生动有趣，情韵盎然，虽然于篆刻不是正宗而是偏师，但对于篆刻创作的切合时代而言却是拥有很好的启迪价值的。

今年是105周年社庆，《当代西泠印社研究十论》对近五年印社的活动进行了理性思考与精炼的论述，对于社内外了解西泠印社社务运作的创新意识与实际效果有较直接的帮助，也恳望社员诸公多多关注。

2008年，是西泠印社副社长钱君匋先生谢世十周年，兹刊发一篇社员所撰宏文以志纪念景仰之情。又，今年5月在中国遭受汶川大地震举国哀悼之际，西泠印社积极行动起来，举办现场主题创作会，为抗震救灾尽了自己的一份绵力。此外，关于创社四君子之首的丁辅之先生、关于早期社员陈师曾的印学、关于已故山东的印学前辈邹振亚先生等，都在本辑中有相当的信息反映。西泠印社是个文人雅集之所，这些在印社史上堪称一流的前辈文人，曾经缔造了百年西泠的辉煌，是不能被我们遗忘的。

2008年6月于孤山



西泠印社

● | 2008 · 2 总第十八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泠印社·封泥研究专辑/西泠印社编.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8.8
(西泠印社)
ISBN 978-7-5003-1069-3

I. 封… II. 西… III. 封泥—中国—文集 IV. K877.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3900号

《西泠印社》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启 功

副 主 任 郭仲选 刘 江 朱关田

程士发 韩天衡 陈振濂

魏皓奔 邵宗远 程大利

编 委 包正彦 黄镇中 金鉴才

童衍方 余 正 熊伯齐

孙慰祖 祝遂之 李刚田

孙其峰 杨鲁安 张建平

主 编 陈振濂

副 主 编 包正彦 赵一文 黄镇中

江 吟

编 辑 (姓氏笔画为序)

王佩智 邓 京 吕金柱

朱妙根 吴 莹 邱 云

余 成 张钰霖 林鹏程

顾祥森 郭超英 桑建华

责任编辑 崔 伟

执行编辑 郭超英

封面篆刻 王义骅

出 版 荣宝斋出版社

编 者 西泠印社

地 址 杭州市延安路484号

市府综合楼3号楼5楼

邮 编 310006

电 话 0571-85812993

传 真 0571-85812974

电子信箱 xlysshekan@sina.com

xlys_1904@163.com

设计制作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下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6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

书 号 978-7-5003-1069-3

定 价 28.00元

● | 目 录 | ■ CONTENTS |

主编导语

封泥研究

临淄新出西汉齐国封泥研究 ————— 孙慰祖 04

封泥刍议三题 ————— 杨广泰 19

粪池中掘出的辉煌

——秦封泥惊现长安城 ————— 歧 岖 31

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概述 ————— 童衍方 37

鉴印山房藏汉封泥选 ————— 47

封泥研究资料征存 ————— 郭超英 辑 53

当代印坛

当代西泠印社研究十论

引 言 ————— 陈振濂 58

“顶天”、“立地”：社务工作方略新思路 ————— 林启德 59

创作视野之开拓 ————— 刘亦民 59

综合才能之倡导 ————— 贾思伯 60

学术研究之推进 ————— 李 晴 60

与社会时事相呼应 ————— 王佳力 61

印文化之整合 ————— 曾佳麟 62

百年社史之续写 ————— 刘 炎 63

社务运作之创新 ————— 姜鉴西 63

祭祖祀贤仪式之恢复 ————— 黄竹禅 64

金石学之复兴 ————— 蒋振泰 65

对“当代人文环境下印章的文化功能”的感触 ————— 昌少军 66

佳作赏析

2008奥林匹克图标篆刻选 ————— 美国金石印社 68

喜读龙公近作 ————— 韩天衡 70

清初女词人徐灿身世及白描大士像 ————— 徐润芝 72

印人研究

钱君匋和桐乡君匋艺术院

——纪念钱君匋先生逝世十周年 ————— 鲍复兴 75

岭南两大印家谢景卿、黎简 ————— 梁晓庄 82

创作谈

陶瓷印制作之我见 ————— 吴自标 88

印社信息

西泠印社关于向四川地震灾区人民伸以援助之手的呼吁书 ————— 91

濡毫抒大爱 援笔颂英雄

——记“西泠印社社员抗震救灾纪念现场创作会” ————— 91

百年华彩乐章

——中国当代优秀水彩画家提名展系列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 93

陈半丁百印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 ————— 94

由丁鹤庐研究会主办的西泠印社纪念活动在日本举行 ————— 95

“邹振亚先生书法篆刻遗作展暨《韦绝籀作品集》首发式”

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 ————— 96

社藏撷珍

封二 六朝 隋造像及钟鼎拓本屏之一

封三 《澂秋馆藏古封泥》

封底 清 刘度 观瀑图

临淄新出西汉齐国封泥研究

□孙慰祖

一、临淄封泥发现之历史回顾

中国古代封泥的发现，一个突出现象是以“封泥群”的形态出土，而后才引起考古学家的重视。集中弃置、掩埋封检及其封泥是古代官署处理简牍文书与收受其他物件过程中的一种作业程序。故所遗封泥的发现，具有比较密集的特点，同时也以残碎居多。这与墓葬发掘多为零星之数完全不同。属于此种形态的，到目前为止，早年有四川某地、陕西西安某地（具体地点均不详）和山东临淄，20世纪中期以后有西安相家巷村、西安未央宫遗址、徐州土山以及河南平舆古城村等数处。

已知具体出土地点的，多已证实为官署遗址。徐州土山封泥为堆土中散见，是已被移动所致。但可以推断，汉代官署遗址当距此不远。据刘鹗在《铁云藏封泥》自序中记述，道光二年（1822）为蜀中某地农民掘获一百多枚，由沽人携至京师后归藏刘喜海、龚自珍、阎帖轩等人。20年后，吴荣光在《筠清馆金石》中辑入了“刚甦右尉”、“雒右尉印”、“严道橘丞”等六枚汉代封泥，亦为蜀中所出。蜀中所出封泥的时代区间为西汉中晚期，封泥文字主要为汉中央及蜀郡、广汉郡等属县职官。这部分封泥，后多归陈介祺、吴式芬，今分别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

陕西西安的秦汉封泥，发现时间不晚于道光末年。此际，一些金石家搜集封泥的兴致渐趋浓厚，除以上诸家外，刘鹗、陈宝琛等人亦参与了封泥的早期鉴藏。刘喜海以关中所出“东郡太守章”、“同心国丞”等30余枚附入《长安获古编》中印行，时在咸丰二年（1852年）。可知陕西秦汉（包括新莽）中央政府属官及各地郡守官印封泥集中出土，即在这一时期。吴式芬、陈介祺后来编入《封泥考略》的封泥，从职官品类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西安。

山东地区发现封泥，约在同、光之际。光绪二年（1876），陈介祺获得齐鲁所出“姑幕丞印”封泥，惊异地告知吴云：“东土竟亦有封泥”（《簠斋尺牍》光绪二年致吴云书）。初期收集齐鲁封泥的，除陈介祺等外，尚有郭裕之（申堂），后者所得数量最多。罗振玉

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郑庵所藏封泥》所收即为郭申堂藏品，收入封泥148枚。其中除四件疑伪，少数几件未能确定外，约百余件可信为临淄出土。这一判断的依据是，郭藏封泥文字风格和泥型以及官名、地名之所涉范围，都和后来临淄刘家寨陆续发现的封泥，属于同一系统。（图1）



图1 郭申堂藏临淄封泥（部分）

关于临淄出土封泥的记载，始于1936年王献唐撰《临淄封泥文字序》。据王氏记，光绪二十三年，临淄县城北刘家寨附近农田出土封泥一坑，共得100余枚。次年，临淄县城东门外偏北一带农人制砖时又掘获一坑。刘家寨一带先后发掘十余坑，接踵收集者有郭裕之、高鸿裁、王懿荣、丁树桢、孙文澜、周进、陈宝琛等人。

据笔者校勘，陈宝琛所收临淄封泥亦达约百余枚，合以关中蜀地所出者于1924年拓成《澂秋馆藏古封泥》。这一时期临淄所出封泥递藏情况大致如下：

丁树桢所获封泥，后转归周进。周进从弟周明泰于1928年辑成《续封泥考略》六卷，周氏封泥共450余枚，绝大多数为临淄所出，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

郭裕之所藏170余枚，后归国立北京大学。1934年北大研究部据此编成《封泥存真》一卷，其中大半与罗振玉《齐鲁封泥集存》相重，盖因罗氏1913年辑成的《集存》，乃合以刘鹗《铁云藏封泥》与郭裕之所藏148枚封泥，增入己藏64枚而成，是为最早按封泥出土地编订的分域专谱。

罗振玉所藏封泥后来又有增益，亦多出于齐鲁，现藏日本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

民国23年（1934）春，刘家寨村农田中又出土数十枚封泥，而后村民挖掘不止。时王献唐为省立图书馆征集得500余枚，其中包括孙文澜所获的80余枚。两年后，编辑成《临淄封泥文字》十卷。这部分封泥，今在山东省博物馆。

临淄齐故城是山东地区秦汉封泥最主要的发现地，又以故城内刘家寨所出数量最多，其地在今临淄齐都镇北郊。其次是今城区之东门外。（图2）王献唐《五灯



图2 临淄封泥之有界格者

精舍印话》记，两处所出封泥类不相同，有栏格之秦封泥，多出自东门外；刘家寨所出，则无界栏。秦封泥在临淄县城东门外发现，该地当存在秦代官署。刘家寨位于大城之中区，根据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的两次勘测，已经探明周围有多处夯土建筑遗址及冶铁遗址。根据对该地历年所出封泥职官类别及时代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作出判断，封泥出土位置应为西汉刘肥之齐国时期的某行政官署所在（图3）。这一点容后文具体论证。

1958年，临淄考古队曾在刘家寨作过短期的小规模调查试掘，于T102探沟中出土封泥四十余枚，主要属于西汉初齐国及其属县、乡的封泥（图4）。探沟的位置在刘家寨村西侧。这一发掘所获与30年代前后刘家寨出土封泥的时代属性相一致，职官内容也有相当的重合。这就证实了这一区域即是王献唐所记早年封泥出土地点。至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公私各家比较集中收藏的临淄出土封泥约为1300枚左右。

其后近50年来，临淄一地未见发现大宗封泥的报道。至2003年秋，笔者因馆务赴临朐、青州等地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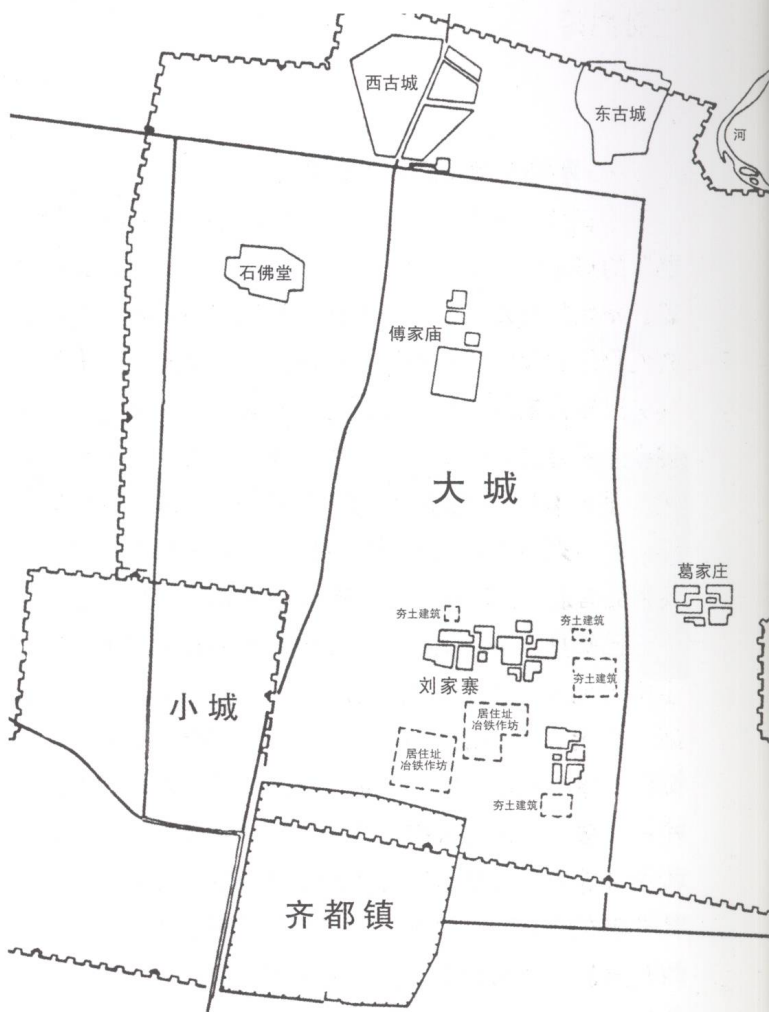


图3 出土封泥之临淄齐故城图



图4

折道往临淄，冀以考察早年出土封泥地点之概貌，不巧因齐故城一带正大规模拓路开发，行车甚为不便而未果。据齐国故城博物馆朱玉德馆长告知，近年附近村民偶有携封泥来馆，但索价较高，大多难以收存。这一信息透露了临淄封泥近年又有新的发现。次年3月，有媒体报道临淄发现封泥并已流散的消息。2005



图 5 刘家寨村口



图 5-1 作者(右)在刘家寨齐故城内封泥出土地点考察

年8月，笔者利用参加潍坊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之便，前往系念已久的刘家寨踏访。临淄区政协武守南先生获知我的来意，热情赐助，联系区文物管理所派员同往，免去笔者探路寻道的周折。刘家寨以西的公路边，现仍残存一段古城墙。进入村口有一村名石碑。站在路边，可以看到疏落的村舍。据文管所专家告知，出土封泥的位置在村落南部的一片玉米地中，当时被人挖掘的区域，约在20平方米左右（图5）。显然，封泥是较集中地弃置的，这与以往的情况相似。考古勘测确定的周围存在居住遗址或夯土建筑，正与封泥的出土形成内在联系。

不期然在一年多以后，笔者见到了一批临淄刘家寨流出的封泥拓片影本和部分照片。因在先前已获知该地曾挖出封泥的消息并考察过具体位置，故亦未感到突然。惟是这批资料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品类甚富，它们与早期临淄刘家寨封泥属于同一系统，可以相互组合为更完整的史料，因而应当作出新的梳理与相关问题的探讨。况且这批资料未来的归宿不得而知，更有必要借此为本世纪初临淄再出大宗封泥的史实存一记录。

二、刘家寨封泥群所见齐国官制与地理

新出土封泥资料数量已逾千枚，基本完整而可确释

者，占了多半。以往刘家寨出土封泥基本上为高祖所封刘肥齐国之不同系统职官印文，另有部分私印。今以《齐鲁封泥集存》、《封泥存真》、《建德周氏藏封泥拓影》（即周明泰《续封泥考略》所录）、《临淄封泥文字》诸书所辑齐国封泥以及50年代齐故城试掘所获封泥，与目前见到的刘家寨新出封泥作一形态、文字风格和职官范围的校勘，可以大致提取出临淄刘家寨封泥群的范围与特点。这一封泥群所见职官，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 一、齐国诸卿及其属官；
- 二、齐国所辖及相关县、邑官；
- 三、齐国辖境内之乡官。

齐国以外之郡国官印，发现甚少，中央的朝官系统，也罕有所见。后者在早期的几种著录中，曾或见之，但无法确切判断它们的来源，颇疑有他处所出杂入。

根据这样的官职印文构成情况，封泥群反映出当时事务往来范围主要限于齐国内部。这就明示我们，刘家寨村出土的封泥，属于齐王国某一行政官署的遗物。以往齐鲁所出封泥职官，属齐国封域之支郡以及文帝16年后从刘肥齐国削出另立之王国者亦有若干，如“临淄丞相”、“淄川王玺”、“淄川中尉”、“淄川内史”、

“齐昌守丞”等，但在后来王氏《临淄封泥文字》及此次刘家寨新出封泥中未发现。故其来源，亦或在别处，恐与刘家寨封泥不为一系。

古封泥于学术研究之价值，罗振玉曾精要地概括为：“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郑庵所藏封泥序》）。就20世纪末以来发现的秦汉封泥资料来看，各处所存的职官信息在时代与范围上自成体系。相家巷封泥群为秦宫廷官署的遗存；土山封泥群资料尚未完全发表，据笔者在徐州博物馆所见的部分实物，可初步判断含西汉早期刘交之楚国所遗；平舆古城村封泥群，为西汉中期至东汉末汝南郡署之遗。在临淄刘家寨封泥群中，集中保留了十分丰富的齐国诸卿及其属官、齐国属县的职官史料，是其独特价值之所在。

首先，关于王国官制，《史记》、《汉书》并无系统集中的记载。笔者曾在《中国古代封泥》一书中以临淄出土封泥为主，汇订《封泥、印章中所见西汉王国官制》一表。今益以近年新出者，计可以征得齐国诸卿及属官职名达77种（不包括郡、县官属）。这是目前有关汉代诸侯王国官制最为集中的一批史料，比之以传世文献记载和其他出土实物资料，尤具有翔实性、确定性和系统性。近世史学界对于西汉诸侯王国官制研究，主要是依赖临淄封泥资料，结合史籍散见的记载，而获得整体性突破的。临淄封泥不仅以翔实的职官体系证明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序》），其所置诸卿和属官一应俱全，与中央王朝的体系基本对应，而且出现了不少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下简称《百官表》）所未载的官属，因而得以由王国之职官反证《百官表》所阙略之朝廷职官记载。

临淄封泥所反映的刘齐官制状况，可以说是“七国之乱”前整个西汉诸侯王国官制的缩影，从职官体系方面有力地证明汉初分封的诸侯王权势益大，与天子“尊无异等”的状况。

临淄封泥所见齐国诸卿及属官可归纳为下表：

御史大夫		齐御史大夫
	属官	齐御史丞
太常		齐太祝印、齐祝长印、齐祠祀印 齐祠祀长、祠官之印、齐太史印 庙守室印、庙印、守庙 齐哀庙长、齐悼惠寝、齐哀寝印 齐文寝长、齐悼惠园、齐哀园印 齐文园长
	属官	
宗正	属官	齐内官印、齐内官丞、齐家丞印
郎中令		齐郎中印、齐郎中丞
卫尉		齐卫士印
	属官	附：齐三士印、齐走士印
太仆		齐太仆印
	属官	齐太厩印、齐太厩丞、齐厩丞印 齐中厩印、齐中厩丞、齐家马丞 齐中右马、齐中左马
典客		齐大行印
大司农	属官	齐太仓印
少府		少府市印、少内、齐太官印 齐太医丞、齐乐府印、齐乐府长 齐左工丞、齐工长印、齐居室印 齐居室丞、齐宫司空、齐宫司长 齐宫司丞、齐永巷丞、齐中谒者 齐宦者丞、齐御府印、齐御府丞 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采铁印 采铁、齐铁官丞、齐采铜丞 齐钟官长、齐都水印、齐都水长 官监
	属官	
中尉		齐中尉印
	属官	齐武库丞、齐左司马
将作大匠		大匠、齐大匠丞
詹事（大长秋）		齐长秋印
	属官	齐中傅印、齐食官丞 齐后中府、齐□后□
内史		齐内史印、齐内史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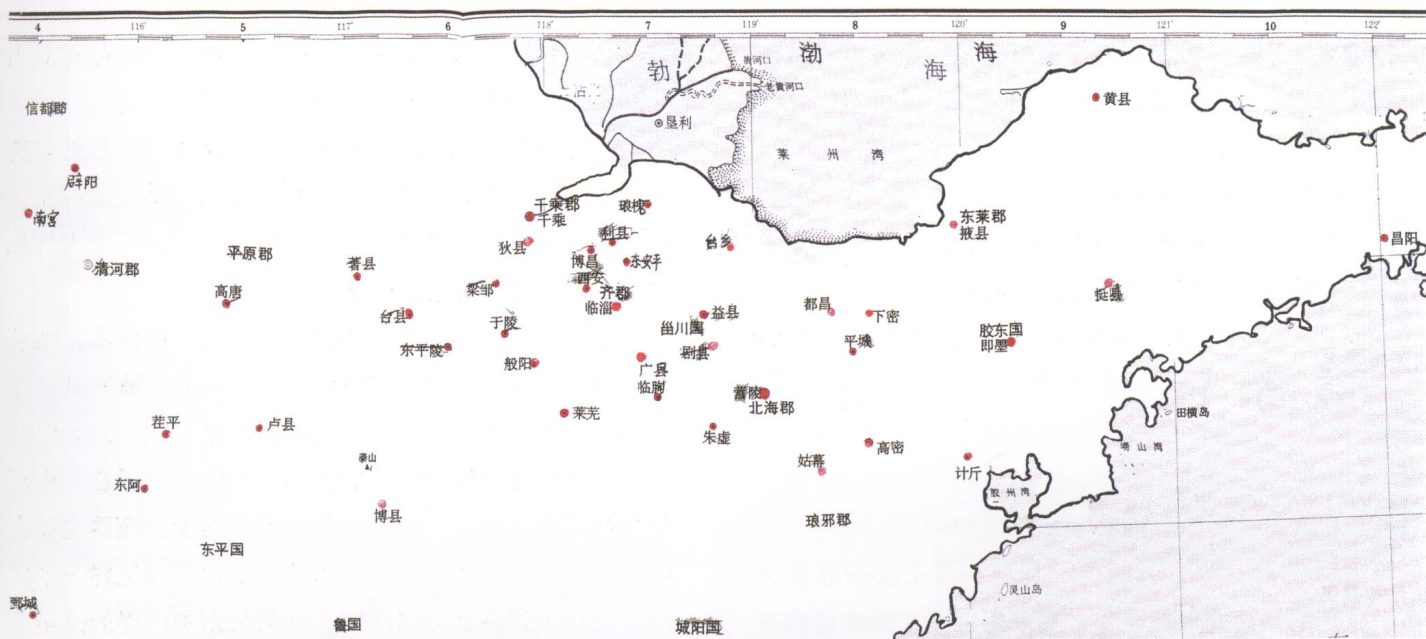


图 6 临淄出土封泥文字地名分布图

近年新见刘家寨封泥中齐国诸卿职官另有以下11件，多为前所未见者：

齐文园长、齐文寝长 为太常属官。文园、文寝为主掌齐文王园、寝之官。《汉书·诸侯王表》（下简称《诸侯王表》）：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文王刘则嗣，十四年（公元前165年）薨，亡后。封泥时代当在文帝十五年稍后。另见“齐哀园印”、“齐哀寝印”，为齐哀王刘襄之园、寝职官。《齐鲁封泥集存》亦著录各一。刘襄为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立，卒于文帝二年。

齐祝长印 《百官表》太常属官有“太祝令”。旧出临淄封泥另见有“齐太祝印”。此印文曰“祝长”，当为职事之官。湖南长沙出土石印有“长沙祝长”。

庙室守印 “庙室守”当为执掌汉高祖寝庙之守护之职。《汉书·惠帝纪》：惠帝即位，令郡诸侯王立高庙。师古注：“诸郡及诸侯王国皆立庙也。”师古注《车千秋传》又曰：车千秋所职高寝郎，即“高庙卫寝之郎”。《临淄封泥文字》亦曾著录同文封泥一枚。

祠官之印 汉太常属官有“祠祀令”，主祭祀，为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改太祝令而来。然此“祠

官”当为王国原有，景帝改祠祀令或为并太祝、祠官所置。又皇后宫（詹事）属官亦有“祠祀令”。故此曰“祠官”而非“祠祀”，恐与景帝改太祝不为一事。

齐御史丞 御史大夫佐官。《百官表》：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据此封泥可知王国御史大夫属官亦同汉朝。

齐乐府长 《百官表》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临淄封泥另见“齐乐府印”。

齐宫司长 “齐宫司丞”已出土多枚，此“宫司长”为仅见。《百官表》少府属官有“司空令丞”。“宫司长”当为“宫司空长”之省，长沙出土官印有“宫司空丞之印”。

少府市印 《百官表》未记少府有“市”。此当是王国所置之官市。少府主“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王国少府之市，当与职司贸易赋税有关。

齐家马丞 太仆属官。《百官表》太仆下有“家马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桐马。

齐家丞印 《百官表》载：侯国置“家丞一人”。刘齐为王国，此“家丞”当为太子宫之属官。《通

典·职官十二》：“家令，秦官，属詹事，汉因之。”服虔曰：太子称家，故曰家令。太子之有家丞，据此得证，可补史、阙。汉官印有“赵太子丞”，其不称“家丞”，可知太子宫官后来亦有改易。

齐正之印 “齐正”未明职事。待考。

目前所获封泥虽尚不能尽涵当时齐国职官之所有，仅以此七十余种，但已可窥见刘肥齐国置官之周备细密。其中尚有若干无史可征或未见直接记载之名目。如前举“庙室守”、“齐正”、“少府市”，以及《续封泥考略》著录之“齐三士”、“齐走士”、“齐工长”等，都是可以补充文献失载的汉代官制的资料。

概而言之，临淄封泥资料在相当程度上修复了史籍缺略的汉王国官制体系，为尤可珍视之学术价值。

新见刘家寨封泥中，含有数量众多之县、邑、乡官印，是这批资料的又一特点。汉初王国各领有支郡，俨如朝廷。《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六年，“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据周振鹤考，刘肥之齐国，尚有琅邪，计得七郡之数。（《西汉诸侯王国封域考》）今存西汉早期封泥出于齐地者，有“济北守印”、“临淄守印”、“城阳郡尉”，皆刘肥所领支郡之官。这些封泥确定为刘肥齐国之属的依据是，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则上述封泥必在此前；又文帝十六年临淄郡分置齐、淄川两王国，则必不得再有“临淄守”；济北在文帝十六年封为刘肥之子刘志王国，亦不得有郡守；城阳，在同年封刘喜，则其为刘齐支郡而有“郡尉”的时间当在此前。但以上郡守、尉之封泥，系早年出土，今已无法确知其为何地所出。以故，齐国初封之时，地域广远，辖县颇多。新出封泥文字中未见郡官，而所涉及的县、邑则有51个：般阳、辟阳、博昌、博阳、茌平、昌阳、长安、狄、定陵、东阿、东安平、东平陵、都昌、阜陵、高密、高唐、姑幕、广、海、黄、即墨、计斤、郊、勳、莱芜、琅槐、利、梁邹、临胸、临淄、卢、卢奴、磨、南宫、彭城、平城、平都、著、台、委壤、卫、西安、下密、新丰、

夜、益、营、营陵、熒阳、于陵、朱虚，与以往临淄出土封泥所涵地名大多重合。包括下文还将涉及的众多乡官印，亦有同样的情况。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性县、乡官印系统，同时也说明，这批资料流传过程中基本上未有其它地点封泥的杂入。对于学术信息的准确性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以上县、邑，以分布于汉初胶东郡、胶西郡、临淄郡、济北郡最为密集（图6）。这样一个范围的县、邑封泥集中出自刘家寨，可以说明刘家寨一区，乃为当时与齐国所辖各县发生广泛联系的行政官署之所在。由历年临淄出土的县、邑官印封泥来看，其所涉范围主要在西起博平，东至东牟，北及乐陵，南达下邳这样一个区间，仅有少数县名越出此域。这与文献中求得的高祖六年齐国所领七郡的地域大致相近，封泥的时代与其所反映的齐国封域之变迁形成了互证。这一特点，也限定了这批封泥的时代，应在这些县邑属于文帝十六年前之全齐的时期。盖其后琅邪属汉，其余六郡分置七国，齐王将闾所领仅临淄郡之一部，不可能再与削出之地存在如此密集之联系。故诸县、邑范围之广与前文所考齐国诸卿属官之完备庞大状况亦相契合，所揭示的皆是刘齐全盛时期职官与行政地理之面貌。封泥文字研究之有补于史，于兹可见。

刘家寨新出县邑官印封泥，亦有若干其地名不在刘肥封域之内者，如彭城、宁陵、平都、卢奴、熒阳、长安、新丰等县，乃是各地与齐地往来文书或物品之封检所遗。则刘家寨之官署，亦与齐国以外之郡国发生联



图 7

系。在齐地县邑之中，又以临淄县之封泥品类最多。盖两汉临淄均为王都或郡治所在，其置官最为齐备亦在情理之中，除通常的县令、长、丞、尉外，尚见有若干特设之官。过去出土者如“临淄市丞”、“临淄铁丞”、“临淄卒尉”（图7）。新出封泥中有“左库之印”、“库印”、“右市”、“西市”、“市府”等，则其出土地与府库、市易存在一定关系。临淄“有服官、铁官”，见于《汉书·地理志》（下简称《地理志》）记载。新出刘家寨封泥中“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和“齐武库丞”达30余枚，而刘家寨周围已勘查得冶铁遗址与居住地区遗址多处。这些封泥资料显然帮助我们联结了刘家寨之官署与附近的铁官与武库之间的关系。

新见封泥尚有若干其地无考、侯名失载之侯邑，如海邑、卫邑、疆侯邑、营侯邑、委壤侯国。其中卫、委壤为以往未有之地名，证实汉初齐地当有其封邑。

以下侯国（邑）封泥见于新出资料，可考得其封年与侯名。

请都邑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下简称《侯者年表》）作清都侯，文帝元年封，六年国除。

广侯邑丞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下简称《功臣表》）：高祖六年封召鸱为广侯。文帝七年除。

博阳邑丞 《功臣表》：高祖六年，封陈濞为博阳侯。

台侯邑丞 《功臣表》：高祖六年封戴野，景帝三年诛。

利邑丞印 汉初未见侯名，疑失载。武帝以封刘婴，见《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但其封年与此封泥之时代不合。

都昌侯相、都昌邑丞 《功臣表》：高祖六年封朱轡为都昌侯，传至景帝中元年无后国除。

郊侯邑丞 《侯者年表》：高后元年封吕产为郊侯，八年诛。封泥下限为公元前180年。

辟阳邑丞 《功臣表》：高祖六年，封审食其为辟阳侯，传至景帝二年除。

平都侯相、平都邑丞 《侯者年表》：惠帝封刘到

为平都侯。

侯丞印 《侯者年表》：文帝封齐悼惠王子信都于营。

阜陵邑丞 《汉书·王子侯表》：阜陵侯安，淮南厉王子，文帝八年封。八年，为淮南王。

侯邑丞 《功臣表》：高祖八年封。留盼为疆侯。

另有其地可考而侯名未载之例凌辱：

益邑丞印 益，在北海国，见《地理志》，今山东寿光北。

定陵邑丞 《地理志》在颍川郡，今河南舞阳县东北。

以上侯国多为高帝所封之功臣侯，其除年也基本上在景帝初年以前。这是新出刘家寨封泥断代的又一重要依据。

至此，完全可以确定，目前刘家寨新出封泥，其时代属西汉早期。

值得重视的另一部分史料是封泥中保存了如下若干乡官印文：

安乡、安国乡、安平乡、北乡、昌门乡、昌乡、成乡、定乡、东阊乡、东乡、都乡、端乡、高望乡、高乡、广陵乡、广文乡、广乡、画乡、建乡、勳里乡、輓乡、利居乡、利乡、路乡、吕乡、南乡、平望乡、祁乡、请乡、台乡、宛乡、武乡、新息乡、信安乡、阳夏乡、宜春乡、益利乡、犹乡、右乡、原乡、谏郭乡、昭乡、正乡、中乡、左乡等45种，加上以往临淄所出的安乡、白水乡、朝阳乡、句莫乡、利乡、良乡、南成乡、上东阳乡、尚父乡、西昌乡、西平乡、西乡、休乡、郁狼乡等，共存有乡名60左右。

在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封泥中，大量乡官印文的保存是临淄封泥的又一个显著特色，为其地区的封泥所未有。这当然也应是考虑遗址性质的因素。汉初县辖乡之数，约不超出《百官表》所载平帝时的每县四乡左右。则，如此数量的乡官封泥汇于一地，再考虑到残失毁灭，当时尚或不止于此。很明显，这些乡印的来源远不止于临淄郡一地，它与前文所考县、邑的地理范围，亦可相互呼应，皆揭示刘家寨存在之官署，既非临淄县，亦非临淄郡，而当属于王国。

新出封泥所见乡官印文，在风格上不同于齐国诸卿属官与县、邑官印。这一现象除了要考虑时代的因素以外，我认为还与乡官印的颁铸权限不同于四百石以上官印有关。乡官印当由郡国自颁，因而，在不同的乡印之间，我们可以看到风格差异也比较显著。若干乡印又见有半通印与方官印二种，如“安乡”——“安乡之印”、“昌乡”——“昌乡之印”、“南乡”——“南乡之印”、“右乡”——“右乡之印”、“昭乡”——“昭乡之印”等等，当是不同时期之制。

这批乡官印文，对于研究秦汉时期乡与县的沿革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汉代的地理文献，所记载的范围基本上止于县、道、国、邑，故对于乡与县的沿革关系，没有多少线索可寻。在临淄封泥中出现的乡，多与《地理志》所载之县和侯国同名。秦汉时的县是由邑聚发展演化而来的，这是建立郡县制的基础之一。《史记·秦本纪》说：“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汉代这一进程仍在继续之中。按《地理志》所记，西汉末的县数已较秦时扩增五百余。其中一部分升格为县后仍沿用了原来的乡名，这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一些属单音节词的县名，后来仍遗有“乡”字，如“台乡”、“祁乡”、“广乡”、“西乡”、“武乡”、“定乡”等县，是为多见现象，我认为此即是透露前后沿革关系的消息。这类地名，至今在各地尚保留不少。

试提取临淄封泥中的乡名，与《地理志》、《功臣表》、《王子侯表》及《史记》中所见的同名县、侯国相考校，虽不能确定两者必为对应之地，但这类现象既多，则亦不能均视为偶然重名。其中一些线索，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判断这些乡的存在及升格为县的时期。

西汉有以下县、侯国与临淄封泥中之乡名相同：

平望，属北海，侯国；

利，属齐郡；

利乡，武帝侯国；

朝阳，在济南郡，侯国；

安国，在中山国，高帝侯国；

南成，属东海郡，侯国，秦为聚邑；

安平，属涿郡，淄川有东安平，又豫章亦见安平侯国，高帝封鄂秋为安平侯；

西乡，属涿郡，侯国；

良乡，在涿郡，侯国；

宛乡，《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孝文十五年，齐分为胶西，都苑。徐广注：乐安有苑县；

宜春，属汝南郡，武帝侯国；

西平，属汝南郡；

阳夏，属淮阳，高帝侯国，秦已见阳夏，《史记·陈涉世家》有阳夏人吴广；

白水，属广汉；

广，属齐郡，高帝侯国；

画乡，汉属齐郡，秦时有画邑；

休乡，休侯国，景帝封楚元王子刘富；

祁乡，在沛郡，侯国，秦为聚邑；

路乡，属渔阳；

辄乡，河内郡有辄，侯国。辄，当为传写之误；

都乡，常山郡有都乡侯国；

武乡，琅邪有武乡侯国，封于建始二年；

成乡，北海有成乡侯国，封于建始二年；

台，属济南，高帝侯国，战国为乡。又齐郡有台乡；

昌乡，东莱有昌乡侯国，即昌乡地，建始二年封；

建乡，属东海，侯国；

中乡，山阳郡，侯国；

定乡，渤海郡有定侯国；

西昌，侯国，封鲁共王子敬；

郁狼，《地理志》未载，《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封鲁共王子骑。

上考诸乡与西汉县名重合者，分布于北至渔阳、南至临淮、西至汝南、东至琅邪这一范围，有些逾齐地甚远，恐有同名。但主要部分仍在齐鲁之地。

无疑，这些乡的建置，主要是秦统一东部以后推行其郡、县、邑、乡行政体制过程中形成的。从文字风格上看，这些乡印大多更具古体的因素，尤以半通印中为

突出，故其颁铸当较县、邑为早，我认为一部分或可入秦而在汉初仍然袭用。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的过程中，一部分乡升格为县；在分封功臣侯、王子侯、外戚侯的过程中，亦有不少以乡为封邑，遂为侯国。后者亦是县的形成因素之一。由于文献资料短缺，现在尚无法剔除其中或存在同名异地的现象，需要历史地理学者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但上述考订，已为确定一些由乡至县的沿革关系提供了线索，当无疑义。

三、刘家寨封泥的形态特征与文字风格

由上所论，新出封泥的时代已可明确。在封泥的形态与文字风格方面，这批封泥亦具有显著之特色。

从拓片影本可推知封泥皆基本上为A式，即封于平检式。泥背之检痕，当有宽、窄两种。由于新出封泥印文风格与过去临淄发现的基本相同，故其封检方式与形态亦必为同一类型。上海博物馆藏清末民国早期出土临淄封泥四百余枚，表面形态以近圆形为主，泥背之检痕多纵向嵌入泥中，故可测得封检之宽度。封泥背面同样有横向的宽带状的束痕，为缚系所封简牍或物件之遗迹。泥块两侧另有细孔，乃固定封泥于检之绳痕，亦横贯于泥中。（图8）此式封检完全是承袭秦代，与新出相家巷封泥比较可见其一致性。据此，亦得以支持刘家寨封泥群的时代不至去秦过远。

另一种泥背较平，表明木检较宽，大部分有横贯中部之凹入绳痕，绳痕较细，两侧亦有固定封泥之细绳孔（图9），与前一种的主要区别在于封检痕与绳痕的宽度不同。在封检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后者稍趋完善。

我们将此类封泥形态归为A型。A型封泥的流行时间在秦至西汉早期。目前刘家寨新出封泥未见越出此型者，故从形态上判断此批封泥下限亦不晚至景帝。

这是封泥形态方面提供的又一时代信息。

刘家寨封泥文字与同期汉朝官印和其他郡国官印文字相比较，地域的风格也很明显：

“高寝丞印”、“奉常丞印”、“居室丞印”、“南郡守印”、“南阳守印”、“软侯家丞印”、“吴



图8 西平乡印（背）



图8-1 西平乡印（面）

郎中印”等文字风格已较为端正、严谨，印面标准比较一致，尺寸相对增大（图10）；齐国属官印形大多较小，风格总体上不如朝官印平整规矩，一部分文字草率的倾向比较突出。如“临淄右尉”、“齐铁官长”、“临朐丞印”、“齐都水长”（图11）等。在乡官印中，其表现尤为明显。究其原因乃是汉初诸侯王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并且自颁官印所导致的必



图 9 临淄侯印（面）



图 9-1 临淄侯印（背）



图 9-2 细绳孔河间王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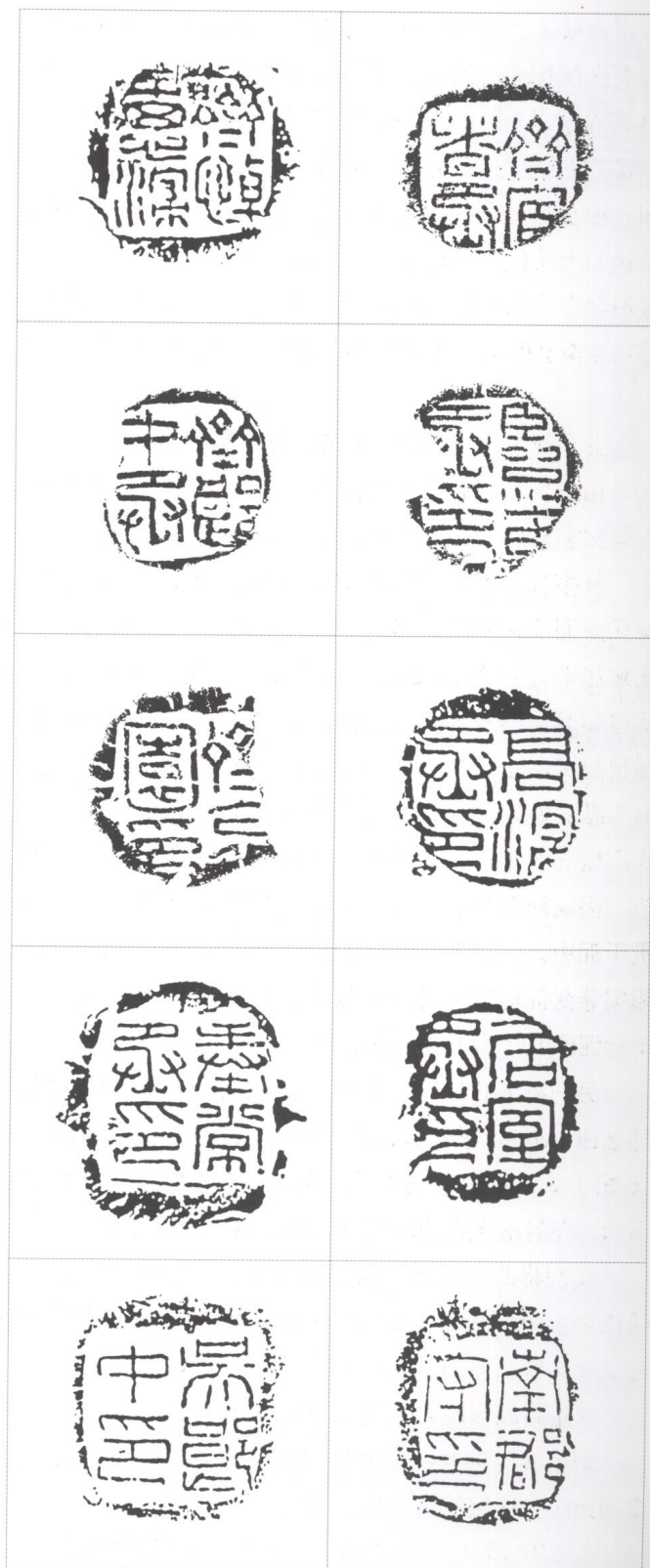


图 10



图 11

印	丞	尉	大	長	都	内	西	乡	相
𠂔	丞	尉	𠂔	長	都	内	西	乡	相
𠂔	丞	尉				内		乡	

图 12 临淄封泥字例表

然现象。王国自颁官印的事实近年又有一突出的证据，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205枚印章，其中有22件不同的县官印和一批楚王属官印，印风自为一系，应出于楚国所铸无疑。故此皆可说明西汉早期不仅王国诸卿及属官可以自置，而且封域之县亦可由诸侯王命官颁印。各王国官印颁铸既非出同源，形成印文、形制、风格差异是很自然的。

试将临淄新出封泥印文中若干常见字的结体作一概括（图12）：

由表中可见，印字“爪”部斜笔挺拔而短；“卩”部末笔下垂之曳尾明显是承秦而来的遗意，也有极少数曳尾不明显，应属风格转变时期的表现。其末笔右行未足而转折下曳的现象仍然部分存在，亦秦印文字之遗风。“丞”字形多偏长，中竖与末笔相接处粗重，也是古体。

“尉”字，所从“火”部位置偏左，而西汉中晚期的改变是移向居中，其左撇先竖下然后撇出，而中晚期则呈“Λ”形；

“侯”字，末两笔往往径作斜势外撇，或作圆笔曳出；

“相”字，“木”旁左右两垂笔存外拓势，“目”

旁上部呈近半圆形者多见；

“都”字，“者”旁中部两斜笔较短，而不作折笔向下垂落之势，构成与西汉中期的区别。

由于时代的书法风格在任何器物制作中毕竟居于主导地位，此种印文差别仍是在同一时代风格领辖下的区域性和制作者的差别，相对于时代共性而言总是非本质的方面，一些实质性的特征仍然是共有的。即使属于不同诸侯王国的官印封泥，其文字上所蕴涵的时代特质仍然会明确地表现出来。以上所分析的齐国印文特点，结合封泥形态的观测，有助于认识汉初齐地官印封泥之特色。

临淄封泥印文还存在部分官印排列方式的不稳定现象。如“临淄右尉”、“临淄左尉”、“司空之印”，（图13）这也是其时代偏早的又一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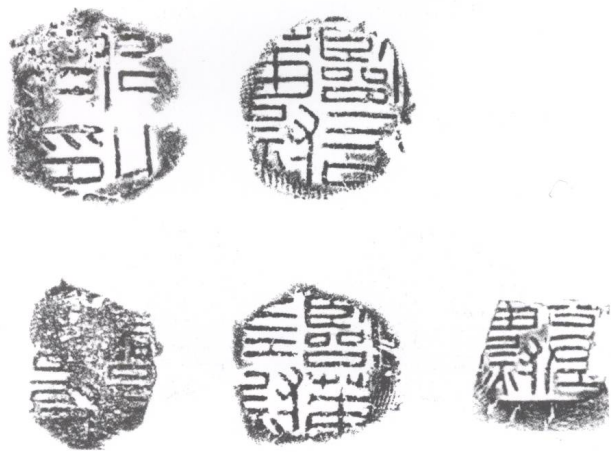


图 13

这批封泥有不少同文官印，细加分析却非同模所出，此种现象在陕西、河南所出秦、西汉、东汉封泥中均见存在。这是透析秦汉时代官印制作状况的颇有说服力的信证。粗略言之，“临淄丞印”、“东安平丞”、“西安丞印”、“新息乡印”等封泥，不同范者均在三种以上，而朝官如“齐内史印”、“齐内官丞”、“齐官司丞”等等亦都不少于三种（图14）。关于汉代官印的颁缴与改铸状况，由于存世官印实物有限，亦无同期同

东安平丞三种：



临淄丞印三种：



西安丞印三种：



新息乡印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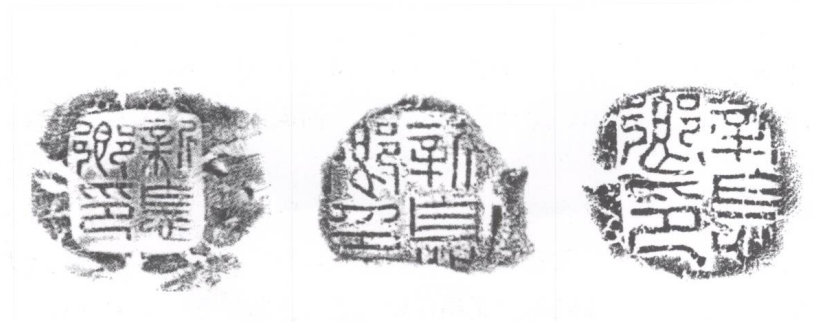


图 14

文的实例可供研究，故历来误解为汉代实行职官印章前后相承袭的制度。由此批资料中所呈现的同文异范现象而其皆属西汉早期齐国之制，足以说明同一职官印章在一段时期内即发生更铸现象，而非“众官即用一印”（《南史·孔琳之传》），这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在职官印制度时代与官署印制度时代，官印颁缴制度的差别。秦汉实行职官印为主的体制，官吏所佩原非公印而是颁给个人，官职更迁固然要缴回原印，但对继任者仍须改铸并颁给新印。我们从实物上看，中国真正实行以官署印为主的制度，是在隋唐时期。此宗封泥中再次出现诸多同文异范现象，都说明更铸官印并非个别现象，从而支持了笔者多年前提出的有关秦汉官印颁缴制度的一些论点。

刘家寨新出封泥数量之多，为该地近几十年来所仅见，虽其部分残损，但官名地名多可辨识，并且出现了不少此前未有的职官、地理史料，故其学术信息，关系到史学、考古与印学研究。在消歇了近五十年后，临淄刘家寨封泥重又集中出现，这一地区的考古勘查工作与遗物保护，值得予以重视。这批封泥资料虽因非科学发掘导致了某些信息的丢失，但经与以往所出封泥的比较，其中王国与县、乡官印体系，相当完整地得到保存，其边界亦比较明确。在临淄封泥系统中，它的学术意义当可与早期的发现互补，形成更为完整的汉初齐国官制、地理与印文研究之实物资料。